

潘之恒结社活动考论

张秋婵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部,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晚明文人结社之风盛行,士人以文会友、诗酒酬唱,形成了一种时代风气和社会潮流。考证潘之恒在各地的结社活动,可以了解晚明文人的生活风貌、精神状态以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潘之恒;结社;影响

中图分类号:IO-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2-0072-06

晚明徽州籍诗人、戏曲评论家潘之恒,一生好游,足迹踏遍南北。在游历过程中,他多次参与当地的各类社集活动,这些活动对潘之恒的文学创作影响甚大。结社大多时候都伴随着文学活动,每次社集活动都会产生相应的文学作品,好事者每每集而梓之,有文集、诗集行世。考证潘之恒在各地的结社活动,可以了解晚明文人的生活风貌、精神状态以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按照社集的目的和内容,可以将潘之恒参与的社集活动分为文社、诗社、酒社、曲社、禅社这几类。

一、文社

所谓文社,陆世仪《复社纪略》云:“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1]文社是在科举取士制度刺激下自发组织的专攻八股制义的社团,明代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文社之兴与此密切相关。文社大致出现于嘉靖末,兴于万历一朝,启祯间达到全盛。文社的兴起,是晚明文人结社的重要特点。

1. 丰干社

隆庆四年,汪道昆在家乡歙县举丰干社,汪道昆《丰干社记》云:

“往余家食,窃称诗馔中,二仲雅从余游,独向往当世作者……遂盟七君子为会丰干。七君子则孝廉陈仲鱼、文学方献成、方羽仲、方君在、方元素、谢少廉、程子虚。会吴虎臣将游江淮,愿以布衣来会。盟既成,虎臣行,适余起家馔中,虚无人矣。诸君子讲业丰干之上,修故约如初。”^[2]七十二

潘之恒《丰干咏序》也记录了自己少年时入丰干社的情形:

“嘉、隆间汪伯玉司马为二仲开社,萃多士于斯溪之南,惟吴虎臣居长,岩之里有三方,为献成、羽仲、君在,伯氏象安以燕游不与入,万历初而不慧始以童子参盟,盖垂四十年,而风调遗响,若断若续。”^[3]五

丰干社是汪道昆为了让他的两个胞弟能够结交名流,接受讲业,提高制义而设立的带讲学性质的文社。汪道昆与潘之恒的祖父、父亲是世交,少年潘之恒参与汪道昆的丰干社是承载着父辈的厚望而来接受科举应试教育的。当然,丰干社也有诗酒唱和活动,潘之恒在万历初以童子参盟,因才华出众得到诸多名流的教诲而在当时的诗坛崭露头角,“自君暨时,辄以古文词受知汪伯玉、王元美、李本宁诸公,赫赫名起。”^[4]五首从此走向一条坎坷、多舛的文学之路。

2. 芝云社

潘之恒曾“读书武林,武林之才士,闻景升名,招人入社,以文学行谊相切劘,社在湖上之南,若有石曰

收稿日期:2008-03-13

作者简介:张秋婵(1963-),安徽歙县人,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安徽地域文化。

芝云,因以名社”,^{[19]卷二十六}社友十人,“十人者,或借计吏,或备博士弟子员,或游太学,或在编列之民,递为师友,不相阂隔,亦犹行古之道也。”^{[19]卷二十六}他们都是当时文坛的才俊,李维桢“游武林则又因景升而内交其友,风韵道上,知略辐辏。”^{[19]卷二十六}即便是声名熠熠的李维桢也不得不感叹“东南之美尽于是矣!”,“十人所论,撰其理则经,其文则子与史。”^{[19]卷二十六}芝云社成员创作的都是时义之文。“而已,哀其社所为时义,将付之剞劂者,以志其一遇合之盛。”^{[19]卷二十六}所作时义集为《芝云社稿》,李维桢为之作序。与前述参加丰干社不同的是,潘之恒此时业已成名,他是被邀入社,与社友共同切磋制义,身份显然较高。

3. 颍上社

汪道昆《颍上社记》提及该社的创建:“六君子者社颍上,则抵太函氏,愿定久要之言。”^{[19]卷七十五}同里六君子颍上集社,六君子者,汪道昆《颍上社记》记有方君在、潘玄超、潘元仲、汪景纯、方子中、程用修。李维桢《颍上社草后语》云:“社凡六人,与余善者,潘之恒、方以巽。”^{[19]卷一三三}潘之恒、方以巽未见汪氏上述文中提及,可能是后来参与的。李维桢为《颍上社草》作跋,其中有潘之恒、方以巽的时文人选。

“颍上社之为举子业也,不为举子业也,其所取材则老庄左马四家为多,要以谈理中于窳实,较世儒奚啻胜之。假令举子业皆若是,又何病焉?故法得理而胜,未闻理足而离法者也,执法而文尤不具,未闻废法而能文者也。四家之言具在理与法,皆沿六经至,谓六经无法不亦悖哉!”^{[19]卷一三三}

由此可以判断,颍上社是一个探讨制义的文社组织。

二、诗社

结社赋诗,彼此酬唱,在明代文人当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所以诗社是明代文人社集最主要的类别。诗社活动虽然也有宴饮、狎妓、出游、观剧等娱乐活动,但还是以吟咏酬唱为主,每会必有诗作产生。

1. 白榆社

万历八年汪道昆解组回到家乡歙县,组织白榆诗社,潘之恒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汪道昆《送龙相君考绩序》记:“乃构白榆社,据北斗城,入社七人,谬长不佞,君御为宰,丁元甫奉楚前茅,郭次甫隐焦山,岁一至,居守则吾家二仲泊潘景升。”^{[19]卷七}据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记录,白榆山在郡城东南郊,此社乃以山为名。李维桢《鸾啸轩诗序》曰:“友人潘景升弱冠善举子

业,厌之,为古诗,有《蒹葭馆草》。已而里中汪司马先生解组归,首执贽问奇,因与诸弟若四方词人游新安者为社,有《白榆社草》。”^{[19]卷二三}白榆社是明代万历初年影响颇大的一个诗社,钱谦益有“猷中主盟,白榆结社,腥醲肥厚之词,熏灼海内”的说法。^{[19]卷二}由于汪道昆在隆万诗坛的领袖地位,白榆社声誉日起,“诸宾客来自四方,择可者延之入”,^{[19]卷七}除了上述《送龙相君考绩序》中提到的最初参加的七人外,陆续加入白榆社的有余翔、屠隆、徐桂、李维桢、朱多炆、沈明臣、章嘉祜、周天球、俞安期、吕胤昌、吴稼澄、胡应麟、张一桂等,他们大都是江浙一带的名士,潘之恒与他们一起吟诗宴饮,留下了《白榆社草》诗集。如果说当初潘之恒加入丰干社是长辈们的提携,只在徽州一隅略有诗名的话,那么参加白榆社后,便声名鹊起。

2. 南屏社

万历十四年八月,潘之恒在杭州参与南屏社集会。汪道昆《南屏社记》云:

“往,余由武林而趋吴会,即次西湖,四方之隽不期而集者十九人,于是乎有中秋之会……自四明至者则屠长卿、汪长文、杨伯翼,自吴门至者则曹子念、毛豹孙,自华亭至者则曹叔重、陆君策,皆从长卿;自京口至者则邹汝翼、茅平仲,皆从司马;自天台至者则蔡立夫;自金陵至者则李季常。乃若潘景升则前驱,徐茂吴、李含之、杨思锐、俞叔懋暨不佞,明卿则东道主也。”^{[19]卷七十六}

这次诗会的首倡者还是汪道昆,参与者有屠隆、汪长文、杨伯翼、曹子念、毛豹孙、曹叔重、陆君策、邹汝翼、茅平仲、蔡立夫、李季常、潘景升、徐茂吴、李含之、杨思锐、俞叔懋、卓明卿。南屏之会聚集了当时诗坛的许多名流,用汪道昆的说法就是“东南之美具矣”。南屏社实际上是白榆社的延续,并从家乡歙县移至经济繁华、文化活动更加丰富的东南胜地杭州,形成了以汪道昆为首的诗歌活动中心,后七子、后五子、四十子派成员大都产于其中,因此出现了不同的诗派群体和互相影响的诗歌风格。

3. 长安结社

潘之恒万历十七年抵达北京,他在《箬侠》一文中提到:“余乙丑(万历十七年)岁到燕京。”^{[19]卷五}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程布衣可中》云:“初入汪司马白榆社,继与梅季豹、何无咎、潘景升同盟于长安”。可见,潘之恒曾经在京城与程可中、梅季豹、何无咎等人结盟,此行有诗集《黍谷集》。

4. 郢中社

万历二十一年潘之恒游楚期间,与朱开美、张无

彊、葛更生、张永卿、方子公、袁小修等结郢中社。潘之恒《郢中社诗序》云：“于是千人中特起者为王孙开美、文学张无彊、葛更生、张永卿。无何，方子公至自京口，袁小修至自武林。于时春也，日相倡和，积而成帙，署曰郢中社诗。”^{[10]15}此次社集活动结果为《郢中社诗》。

5. 金陵社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丁集卷七《金陵社集序》提到明末金陵文人聚会，初盛于嘉靖中叶，再盛于万历初年，“其后二十余年，闽人曹学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治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臧晋叔、陈德远、邦瞻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熊、吴允兆、柳陈父、盛太古为领袖。台城怀古，爰为凭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伤离之作。笔墨横飞，篇帙腾涌，此金陵之极盛也”。《列朝诗集》所列的金陵诗社的诗人名单也有潘之恒，金陵社唱和结集为《金陵社集诗》。潘之恒有《冶城集》。

与历史上的文学流派相比，晚明诗派及群体在构成和维系上对结社的依赖十分突出。隆万之际，后七子派中兴，白榆社、南屏社充任了纽带作用，尤其是白榆社，联系着汪道昆、龙膺、丁应泰、郭第、汪道贯、汪道会、潘之恒、李维楨、屠隆、徐桂、胡应麟、余翔等数十位诗人，社事持延长久，为后七子派成员保持密切联系提供机会，万历中叶，随着汪道昆的离世，派中社事稀少，成员分散，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它已淡出诗坛中心。继之而起的是公安派在阳春社、五咏楼社、葡萄社之上立派，甬上诗派生成于甬上诗社，晚明闽派形成于芝山社、红云社、石仓社，粤东诗派的创立和延续有赖于南园后五子社和南园十二子社，风靡大江南北的结社促成了文坛流派群体繁兴的局面。

三、酒社

所谓酒社，顾名思义就是酒友结成的团体，其特点是因饮立社，社集以饮为务。酒社之饮通常不是单纯的，多与射校、赋诗、歌舞、博戏、狎妓等活动参合在一起。酒社有赋诗的活动，但与诗社有所不同，诗社中赋诗为主，饮酒则为佐诗之料；酒社中饮为主，诗为醉后即兴之作。

1. 留都文酒会

潘之恒在《扯三张》一文中展示了酒会的形式和内容：

“余戊子岁从弇州公在留都右司马邸，无日不与文酒会。酒行数巡，即令取牌扯三张。每一人为主，众环而敌之。或全胜，或全负，或胜负相参，负者取大斗饮之。力款有起逃者，果醉则勿追，佯醉则止。全胜者

众不服，乃再主与众敌，咸大噪尽欢。公间陶然，令两竖子扶掖而入，客复与诸公子竞欢。屡会，其情若新，其酒会之善，毋以踰此。”^{[10]16}酒社之饮叫“校饮”，也就是赛酒会，全然以斗酒为乐，不醉不休，一醉方休，连颇有身份而略显老迈的王世贞也乐在其中，醺醺然被搀扶回内室休息，而他的公子、弟子、门客们继续博酒。这样的酒会是无日不在进行，仅此一斑可见当时留都的社会风气。

2. 武昌文酒会

在武昌期间，潘之恒参与了袁中道等人的文酒会。袁中道《寿南华居士序》云：“予少时游武昌，与西陵丘长孺、大鄣潘庚生等结文酒之会。”^{[10]17}武昌的文酒会透着豪爽、浪漫，《今夕行，同丘长孺、王大掣诸公赋，时有别意》就展现了一次文酒会的盛况：

斗酒会，武昌城。歌递代，舞纵横。武昌今夕无限情，为君高歌《今夕行》。一叶飘零寄武昌，武昌城外暂相羊。黄军浦口同飞盖，芳草洲头共举觞。九陌三市公子宴，五白六赤少年场。紫蟹如土不值钱，擎出满盘带雪霜。结伴追欢到此夕，天涯兄弟皆来客。我辈意气本豪雄，尊前况有新相识。今夕何夕兴翕习，子夜微歌声转急。击剑人逢击筑人，有情笑与无情泣。天星楼上花枝架，采珠拾翠杯无算。传说陆郎珠班骝，繁弦急管杂哀叹。君不见黄牛峡朱雀道，山色苍苍水浩浩。此时相逢不尽醉，东西别去令人老。^{[10]18}

明中叶后的武昌，商业发达，城市富庶，乃歌舞繁华之地，酒社活动体现了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潘之恒《涉江诗选》有《今夕行同吴景倩、王任仲、丘长孺、袁小修饮五咏楼赋》、《武昌曲八首》等诗描写武昌结社的情形。《武昌曲》题注曰：“余时邀四子结社五咏楼，寻各散去，种种悲婉，托诸乐府歌之。”^{[10]19}可以把这看作是潘之恒在武昌倡发的五人结成的“五咏楼社”，这是大社之中的小社，这种现象也是极为普遍的。潘之恒游武昌有《涉江诗选》。

3. 岩镇结社

万历二十五年春，袁宏道解组后游览山水来到歙县，客岩镇潘之恒娑萝园，相与唱和。袁宏道《伯修》云：“已复道岩镇，客潘景升家，东西南北名士凑集者，不下十余人，朝夕命吴儿度曲佐酒。”^{[10]20}潘之恒、袁宏道、陶望龄、方子公等人在岩镇结社，袁宏道此行有《赠潘景升》、《潘庚生馆同诸公得钱字》、《赠景升》等诗收于《解脱集》中。^{[10]204, 205}陶望龄《歌庵集》有《集潘庚生馆得钱字》诗。^{[10]203}

酒会之兴是明代社会和明代文学的一个特别现象。明万历时期社会的商业化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

城市生活日益丰富,刺激了社会的享乐之风。从世风方面来说,万历时期人们普遍好饮、好游、好色、好玩乐、好享受,以致嗜酒、狎妓、赌博等蔚然成风。受这种世风影响,万历士风为之大变,当时文人多不喜家居而好结伴游宴,他们出入酒肆,往来歌楼,沉于声色,醉于酒场,这也成了潘之恒的日常生活内容,在饮酒中沉迷,在游乐中遗忘,以逃避科举造成的失意,家庭生活带来的重压。

四、曲社

明末金陵文人结社异常活跃,各种社集活动频仍,但是金陵社集最多的还是曲社,歌舞演剧等娱乐活动在明末文人社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金陵自古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尤其是秦淮河畔,名伶歌妓云集,但凡文人士大夫涉足金陵,无一不吟咏章台而留下千古绝唱。金陵作为明代的留都,聚集着众多不得志的闲职官员以及怀才不遇渴望有朝一日金榜题名的科考失意士子,结社活动往往把他们融合在一起,成了他们精神的需要。潘之恒曾记载:“金坛曹公家居多逸豫,恣情美艳,隆庆庚午,结客秦淮,有莲台之会,同游者毘陵吴伯高、玉峰梁伯龙辈,俱擅才调,品藻诸姬,一时之盛,嗣后绝响。”^{[7]外纪卷之十七}结社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品藻诸姬”,同时伴随观剧、评剧、宴饮、吟诵活动。

潘之恒在秦淮游历最久,自万历十三年(1585)始,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客死于南京,一生中有约一半的时间在金陵,尤其是晚年“侨寓金陵,留连曲中,征歌度曲,纵酒乞食,阳狂落魄以死。”^{[8]600}潘之恒平生参与最多的也是这类曲社活动。他的足迹遍及金陵、吴门、毘陵、武林、长安、武昌等地。

《鸾啸小品》卷二《初艳》:“余结冬于秦淮者三度,其在乙酉(万历十三年)、丙戌(万历十四年)。流连光景,所际最盛。余主顾氏馆,凡群士女而奏伎者百余场。”在主顾氏馆期的两年时间内,潘之恒组织、参与的观剧活动就有百余场,曲社活动之频繁可谓惊人。

《鸾啸小品》卷二《虹台》:“昔在丙午(万历三十四年)秋冬之交,余从秦淮联曲宴凡六、七举。”^{[9]林云仪}记载:“丙午冬余主双鸾馆之盟,集名姝十三人,云仪首出为之领袖。”^{[10]8}《黄玄龙诗集》有七言古诗《赋得三艳歌同顾郎哉、吴允兆、臧晋叔、吴翁晋、潘景升、吕乐师分得销许醉三字》、七言律《同社臧晋叔、陈延之、潘景升、罗子昭、张朔少、张康叔、黄隐叔、汪二鲁、叶

循父、吕乐师、张季黄、潘初叔携妓泛舟城西晚眺赋七言近体得亭字》记其事。这都是有度曲、有宴饮、有歌妓的曲社活动。

潘之恒《朱无瑕传》云:“至己酉(万历三十七年),冰华生结社秦淮,而声益振。先是蒋公鸣寓,见其《闺怨诗》,遍一觐,与定交。始招集诸子联社曲中。惟崔嫣然、傅灵修最昵。近期相聚为多。当岁暮,盟尚未解,今集中半为同赋草。”^{[11]外纪卷之二十}潘之恒先是见识了朱无瑕的才华,才与之定交,并同崔嫣然、傅灵修等名优缔结曲社。该传后序补云:“己酉(万历三十七年)秋冬间,与泰玉结吟社者凡五,所集皆天下名流,粤之韩、楚之钟、吴之蒋若陈若俞、越之吴若凌、闽之二林。”

从上述记述可以知道,秦淮结社内容大都为冶游,包括观剧、宴饮、出游等活动,每次社集均有妓女偕行,这些妓女往往都是一些有声誉、有诗名、心高气傲的才女,她们能歌善舞,尤善吴歆,像朱无瑕、傅灵修、崔嫣然等,都是名冠一时的优伶,她们参与到社集中,既能佐酒侑觞,还能演剧做场,更能吟诗唱和。朱无瑕,金陵名妓,“幼学歌舞,举止谈笑,风流蕴藉。长而淹通文史,工诗善画。万历己酉,秦淮有社,会集天下名士,泰玉诗出,人皆自废。有《绣佛斋集》,时人以方马湘兰云。”^{[12]600}这也是秦淮河文化的特有产物。

潘之恒在秦淮结社过程中组织的演剧达100多场,涉及的歌姬数目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可谓空前绝后。潘之恒在参与这些曲社活动时,写下了大量的品题诸姬的文章,如《金陵妓品》、《秦淮剧品》、《曲艳品》、《后艳品》、《续艳品》、《剧评》等等,他还为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女性做传,《亘史》外纪“艳部金陵”七卷和《鸾啸小品》中就收了他为金陵歌姬所作传记40多篇,其中《亘史》外纪卷之十五收有《杜秋娘》传记1篇;卷之十六收有《王眉山传》、《张润三》、《徐姬》、《张文儒》传记4篇;卷之十八收有《马姬传》、《张楚屿传》、《金陵丽人纪》、《王小奕传》、《葛余芳小传》传记5篇;卷之十九收有《徐翻传》、《王少君传》、《崔嫣然传》、《妥十二传》、《王琐传》、《寇生传》、《林云仪传》、《郝文妹传》传记8篇;卷之二十收有《朱无瑕》、《苗姬传》、《王卿持传》、《董重楼传》、《王月修传》、《宇非英传》、《范素鸾传》、《范文涟传》、《沙飘飘传》、《傅灵修传》、《罗采南传》、《顾绮卿传》、《卫朝》传记13篇;卷之二十一收有《刘润玉》、《马姬许卿》、《杨淑卿》、《杨汉卿》、《李文玉》、《陈念如》、《杨少华》、《徐远音》、《吕雪衣》、《李淡然》、《范氏三云》传记11篇。以至于秦淮佳丽,争相投怀,自称“愿一识韩荆州”,^{[13]外纪卷之三十六}以得到潘之恒传记为幸事,江南名妓

吕倩华更言：“倩固有二愿：一得偕隐猗中如鹿门故事，一得当《巨史》列艳于江南。”^[17]《外经卷之三十六》而潘之恒也以这些内容鲜活的剧品和女性传记被人们重新认识。

五、禅社

士人集会参禅礼佛的风气自魏晋以来久兴不衰，历代数量颇多的“莲社”大致属于此类。“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万历而后，宗风复振。”^[12]晚明士子喜爱禅学，结社谈禅，寻求禅悦之趣，而禅社为习禅好佛者的结聚，故入社时有关佛禅的活动如参禅、念佛、读经也就成为其基本的主题之一，晚明文人习禅成了一种风习，即需通过一定程序来悟晓谛义，获得精神的解脱。

1. 肇林社

汪道昆晚年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思想由人世而转为出世，他躬奉佛事，创肇林社。民国《歙县志》卷十六《杂记》：“汪道昆诵佛法，结肇林社。”汪道昆《肇林社记》云：“余始事佛，延胤公主肇林，胤公兄事珂公，同受天池衣钵。余因胤公介绍，逆珂公。其徒正观明、宗德钦从珂公至，胤公亦招其徒文静、文徽、文言、文瀾与俱来。至郡中，则自如德昂郊劳，如礼会。”^[18]“既就席，日讲楞严经”，^[19]《卷七十五》缙绅学士人者有方定之、詹东图、陈仲鱼、方献成、方君在、方羽仲、郑夷吾、程子虚、吴无怀、吴延秋、王仲房、吴仲足及弟汪道贯、汪道会等。《介弟仲淹赞》云：“昔在甲申，肇林大作佛寺。余主檀越，与二仲俱。”^[20]《陈海山使君》云：“属肇林方作佛事，不佞主盟。三冬咸宿招提，腊日始罢。”^[21]《重修度门寺碑》云：“往肇林作无遮会，海公与大比丘四十八人俱，余故以多闻多公，未竟也。”^[22]《卷六十六》肇林社平时举办的都是一些佛事活动，参禅、读经、做佛事等。

潘之恒《云栖坞志序》云：“余甲申东游武林，太函公囑曰：必诣云栖，谒莲池大师。”^[23]《卷四》潘之恒遵囑参与了肇林社的参禅活动。汪道昆及其肇林社对晚明禅悦之风的兴盛起了较大的传播和推动作用，潘之恒好禅的行径固然与此风盛行密切相关，但是汪道昆个人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其后潘之恒在家乡举天都社，就是一个纯粹的禅社。

2. 天都社

先是潘之恒与当地的一些名士如余书升、鲍正元、王之杰、罗逸等人结盟天都，号为“山中耐久朋”，可看作是天都社的前身。万历三十八年九月九日，复

修天都之盟。潘之恒有《天都社记》记此事：

“在昔嘉靖壬寅，玉山人仲房主盟，而陈、郑、程、汪、江、方诸贤踵至，称一时盛事，其篇什具在，余为梓传之。越六十九年，而复修盟，日皆重九，固非偶然者。先是，普门禅师自五台来，一见黄山而不忍去，将以是为菩提场，而鲍仪部山甫、于比部中甫，实倡之。其明年，同志二三，友人鲍元则、郑无著、丁自宣、虞采兄弟，过余有艺堂，遂定此社。”^[24]《卷七》天都社属于禅社的性质。“今之人入社者，黄仪部贞友、洪奉常平叔、吴学宪无奇、与鲍、于两公，皆慧业文人，潜心止观，禁酒无攒眉，而挥尘多逸韵。”入社之人都是喜爱禅学，有慧业之文人。结社目的：“是社以禅诵念佛，称净业为常规；以诗画作文，称慧业为游息。非是二者，不敢延入。结社原为静修，若会中子弟讲业延师，似宜别选胜地，不得假借此馆。此端一开，久则社废，豫戒之。”

3. 普门社

普门社为黄山法海庵僧人法藏上人提议，潘之恒首倡。潘之恒《普门缘起》记其事：“余过法海庵，法藏开士语余：‘普门禅师之号普门，盖定自五台山，在澄公精舍受其约束，至今无易。请得从法海建二堂，如五台行之，居士幸为之倡。’余敬诺，为刊布普门品于首，以澄公例继之，而用无门洞五缘书名，咸次如右，作普门缘起。”^[25]《卷四》普门社每天的功课为：“入社者各授此册，每日三时，诵普门品一遍，或三遍、七遍，并诵佛号一百八遍，无定数。”入社的条件是：“愿附社中者，量出资若干，随一两至五两，皆得列名社中，如不愿者不强，亦不得列空名，以防滥进。”入社资费的使用是有约束的：“普门社建立养老、延寿二堂，如五台山例，入社出资，书名五缘中，权付主天都社者料理，俟二堂已完，得人主持，即交与之。”普门社与天都社有着相互的联系：“天都社即普门外护，除二堂人，不以烦累，惟从五缘至者，俱合作供。”普门社的成员更众，只要是向佛之人，又能够出资若干，即可以入社。

晚明士人的社会生活是很丰富的，他们在享有富足物质生活的同时，纵情于声色和美酒，遨游于山水之间，在现实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是极痛苦的，政治的黑暗，人生的失意，思想的苦闷，精神的空虚，常常萦绕心头，冲淡了他们从物质和情感生活中得到的快乐。程朱理学的衰微和崩溃，使他们从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也使他们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陷入空虚之中。他们需要寻找慰藉，需要精神上的寄托，于是他们便转向了宗教，求禅问道成了士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士人习禅，众多禅社的出现正是这种狂禅之风的体现。

潘之恒早期参加丰干社、白榆社、南屏社,师事汪道昆、王世贞,后又参加后七子派,中岁转入公安派阵营,成为公安派的主要成员,也是由于人楚与公安三袁密切来往,结社赋诗的经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云:“之恒初以文词受知于汪道昆、王世贞。既而赴公车不得志。渡江历浔阳、武昌,从公安袁宏道兄弟游,宏道称其出汪、王之门而能不入其蹊径。然当时论者又谓之恒依傍汪、王,终不能有所解驳,宏道徒以其论与己合而收之。”^{[14][27]}四库馆臣对潘氏的评价虽显偏颇,但是却可看出潘之恒与汪道昆、王世贞等七子派以及公安袁宏道兄弟的交往和关系。潘之恒诗名的崛起得益于汪道昆、王世贞的教诲和奖掖。但是潘之恒后来放弃科举,游历吴越、秦淮间,沉溺于“宴游、征逐、征歌、选伎”、“品胜、品优、品艺、品艳”等频繁的酒会活动和戏曲活动,这应该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而潘之恒也是由于长期参与这些冶游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观剧经验,写下了大量的戏曲评论文章和妓女、艺人的评传,并被时人誉为“姬之董狐”。就像顾起元所预言的那样:“千载而下,知景升有《亘史》也,即《亘史》有景升矣。”^{[17][28]}给潘之恒带来声誉的不是他的诗词歌赋,而是在参与曲社一类社集活动中产生的名优传记及品姬、品姬的作品。这些声情并茂的传记不仅记载了歌姬们的身世遭遇,对于她们的才情,尤其是

戏曲表演才华,潘之恒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都是戏曲演出史上的珍贵资料。那些结合潘氏自己观剧的体会和心得写出的剧评、曲论,更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的杰作,值得人们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 [1]陆世仪.复社纪略[M].续修四库全书本.
- [2]汪道昆.太函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3]潘之恒.鸾啸小品[M].崇祯二年刻本.
- [4]潘之恒.涉江诗选:卷首[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5]李维桢.大泌山房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 [7]潘之恒.亘史[M].明万历刻本.
- [8]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文钞[M].上海:上海书店,1982.
- [9]袁中道.珂雪斋集:卷一[M].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0]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1]陶望龄.歌庵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12]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13]潘之恒.普门缘起[Z]//闵麟嗣.黄山志定本:卷之三·艺文志上.合肥:黄山书社,1990.
- [14]纪昀.涉江诗选提要[M]//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

责任编辑:曲晓红

Pan Zhiheng's Society Establishment

Zhang Qiuch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hui TV University, Hefei2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late Ming Dynasty saw a flourishing movement to establish societies, in which scholars led the times by exchanging and reviewing their literary works to befriend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surveys Pan Zhiheng's society establishment in different places to facilitate understanding of those scholars' life, minds and literary engagemen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Pan Zhiheng; society establishment; influence

潘之恒结社活动考论

作者: [张秋婵](#), [Zhang Qiuchan](#)
 作者单位: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部, 安徽, 合肥, 230022](#)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2)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14条)

1. 陆世仪 [复社纪略](#). 续修四库全书本
2. 汪道昆 [太函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 潘之恒 [鸾啸小品](#). 崇祯二年
4. 潘之恒 [涉江诗选](#): 卷首.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 钱谦益 [列朝诗集小传](#) 1959
7. 潘之恒 [亘史](#). 明万历刻本
8. 袁中道 [珂雪斋近集](#): 卷三文钞 1982
9. 袁中道. [钱伯城 珂雪斋集](#) 1989
10. [钱伯城 袁宏道集笺校](#) 1981
11. [陶望龄 歇庵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2. [陈垣 明季滇黔佛教考](#) 1959
13. 潘之恒 [普门缘起](#) 1990
14. [纪昀 涉江诗选提要](#) 1997

相似文献(1条)

1. 学位论文 郭永锐 [安徽明代作家研究](#) 2008

安徽其地融汇南北, 贯通东西。随着东南地区经济的崛起, 安徽在明代已是财富之地, 人文之薮。其文学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态势。本文主要以安徽明代诗文作家为研究对象, 作者广泛检索相关文献, 发现明代今属于安徽的七府三州(时属南直)地方共有1071人从事过文学创作, 于是根据作者所获取的大量安徽明代作家的有关资料, 为这些作家撰写了小传, 为95部现存诗文集撰写了叙录, 并在些基础上对其中比较重要的80位作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研究, 希望能对安徽明代文学研究和整个明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资料和参考性的意见。

明初的安徽作家, 部分为元末遗老, 部分归附新朝, 成为开国皇帝身边的重要谋臣。他们都经过了元明之际的社会大动荡, 文风一改元末纤秣之风尚, 如郑潜、郭奎等人诗风隽逸, 内涵也更加丰富。再则这一时期有不少作家本身也是享名的理学家, 如汪克宽、赵、访、朱升, 道学的深厚与文学的新警在他们的创作中相辅相融。

由于中央集权大力加强, 加之永乐至成化年间社会政治也渐趋稳定, 以“三杨”为首的馆阁名臣便掀起颂扬功德的台阁诗风。安徽作家汤胤绩身为武将, 声名鹊起于台阁末流的“景泰十才子”中, 其诗以奇崛豪迈而自成一派。弘治、正德间, 前七子倡言复古, 安徽文学家程敏政以文与道相辅而生的观念给文坛注入了新的元素。张旭、汪舜民、齐之鸾、薛蕙等作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七子主张, 形成别样的文学风貌。

嘉靖至万历以前的几十年中, 唐宋派异军崛起, 与前七子分树旗帜。在安徽作家中也出现了不同的文学宗尚。方弘静仍然循复古之路, 汪子祐、胡松、崔涯、赵钺诸人的创作则以抒写性灵为旨归。明中叶以后, 文人结社之风日盛, 文学的风尚在交游唱和之中悄然变迁。汪道昆、梅鼎祚、潘之恒等著名文学家长期活跃于文坛, 成为当时文坛的中坚力量, 在明代诗坛转变变革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在戏曲剧本、戏曲理论著作、小说诸方面也成绩斐然, 在明代文学通俗化进程中颇具导引之功。万历以后, 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多元并起, 安徽文人吴士奇、江

之、汤宾尹等人大多突破剿袭摹拟之旧弊, 诗风趋于率性自然。汪汝谦、菅履吉善写景物, 潇洒闲适, 更多地表达自我为主的个性化情感。明末社会动荡不安, 安徽文学家中既有首鼠两端的贰臣, 更有抗清爱国的志士, 他们以慷慨悲歌写就了明清易代之时苍凉的社会图景。一些文人投身战场, 壮烈死节, 另一部分则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进入了新朝统治的阴影, 成为明代的遗民。方以智、钱澄之、姚康、余绍祉、蒋臣、朱希焯这些遗民作家也成为清初文学的先声。

本文不仅注意对安徽明代作家的历时性研究, 也注意从地域角度关照安徽明代文学的发展。本文认为安徽明代文学的发展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 其中最主要的是地域文化的交融、科举制度的变迁和商业的崛起三大因素。安徽境内形成的徽州、皖江、淮河三个文化区域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徽州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成为南北文化交融最为充分的地区, 文学也最繁盛。皖江流域的安庆府、池州府、宁国府也因相似的环境因素成为文学家辈出之地。北部的凤阳府地势坦夷, 战乱极易波及, 文学发展便大受影响。

明代中期, 皖江流域和徽州地区经济迅速发展, 很多作家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或者其本身便有从商的经历, 因而这两大区域文学的平民化趋势日益明显。另外, 明代士子的科举之路日益艰难, 大部分生员仕进无门, 只得另谋出路, 这又带来了山人、布衣群体壮大。弘治、正德以后, 不少安徽作家如程浩、陈有守、汪淮、方承训、黄奭等人都因场屋失利, 转而成为草野之士。于是, 挥洒人性的山林文风在安徽便逐渐盛行。